

巴金论

汪应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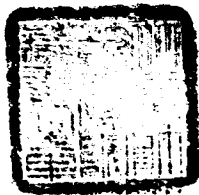
巴 金 论

汪 应 果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3184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43184

责任编辑：郝铭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巴 金 论

汪应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97,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400册

书号：10078·3612 定价：2.20元

DC 63/23

编辑例言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研究从“五四”开始一直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本社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文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同一研究题目，如果有见解不同的著作，只要立论明确、言之成理，我们愿意重复出版，以利学术讨论。

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不包括资料部分，有关文学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将由本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	7
一 巴金童年及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	7
二 刘师复、克鲁泡特金和高德曼	15
三 俄国的安那其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	22
四 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内容及其特色	35
五 怎样认识并评价巴金早期的世界观	56
第二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巴金的创作	61
一 在黑暗中摸索和战斗	61
二 对革命道路的紧张探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	70
三 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	94
四 反映旧中国无产阶级苦难生活的作品——《砂丁》、《萌芽(雪)》	102
五 三十年代的短篇小说创作	109
第三章 《激流三部曲》——抨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 壮歌	131
一 《激流三部曲》的构思、内容及主题	131
二 《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	146
三 《激流三部曲》的艺术特色	196

四	《激流三部曲》的尾声——《憩园》	218
第四章	抗日战争及战后时期巴金的创作	233
一	迎着民族解放的火光前进	233
二	抗战前期、中期的代表作品——《抗战三部曲·火》	246
三	抗战后期及战后的长篇小说创作——《第四病室》与 《寒夜》	256
四	抗战期间巴金的短篇小说	288
五	探索出路与反映现实——巴金创作的“摆”	296
第五章	解放后巴金的创作	305
一	从欢乐到沉思	305
二	解放后巴金的报告文学及短篇小说	314
三	对历史的回顾和思索——《随想录》	326
第六章	巴金的艺术风格	335
一	巴金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艺术风格的形成	335
二	火样的热情与赤子的真诚	378
三	呻吟呼号的人物灵魂	389
四	富有特色的艺术形式	392
五	作为社会“缩影”的家庭题材	397
六	朴素、流畅的语言	399
后记		404

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象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巴 金

引 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曾以这样高昂的笔调，描述过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上、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恩格斯这一段精辟的论述，完全可以运用于我国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在这场时代的大风暴中，的确诞生了一批“巨人”。巴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步入中国文坛起，就象一颗耀眼的巨星吸引了海内外读者的注意。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已经写下了二十部中篇小说，出版了十五本短篇小说集以及三十本散文集，并翻译了二十余部外国作品，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产量高、创作生命长、创造力旺盛的大作家

之一。

巴金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特别是从其中已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沉重桎梏下拼死挣扎并顽强探索解放道路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历尽艰险、大起大落但仍百折不回地向前挺进的时代。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封建主义及其残余始终是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凶恶的敌人。巴金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用自己的作品密切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目标服务，在他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揭露控诉资本的罪恶、表达人民对旧社会的恨以及对新社会的爱的同时，始终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进攻的主要目标，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就使他的作品成为表达中国人民的感情和心声、反映历史前进的要求和愿望的有力武器，并真正体现出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

巴金在吸收西方文学的营养以丰富中国文学宝库、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面是功绩卓著的。中国的现代中长篇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基本上是从西方文学那儿学来的，它与我国古典长篇话本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它必然有一个在我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生长、壮大的过程。早在二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了为数寥寥的几部现代中长篇小说，但它们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还很粗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当巴金的《家》与茅盾的《子夜》等作品相继问世以后，才奠定了我国现代中长篇小说的基础。在创造新形式的过程中，巴金与茅盾有着共同之处，即他们都同是以吸取西方文学的经验为主，而以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为辅，从而体现了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的主流。然而这两位作家又各自具有独辟蹊径的特点：巴金偏重于表现家庭内部的关系，挖掘人物的灵魂世界，茅盾则偏重于描绘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而为我国中长篇小说

的主流开辟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寻求世界人民的友谊是巴金全部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是以外国人民的生活为主要题材的。以后，在他的长短篇小说、散文特写中，都不时地有外国的人物形象出现。可以说，巴金是中国著名作家中描写外国生活、塑造外国人形象最多的一位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们都和中国人民一起友好相处，互相支援，并在危难中产生了生死不渝的感情。解放以后，巴金两次赴朝，并多次出国进行访问，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所熟知的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很多外国作品都经他的手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正因为巴金热心于世界人民的心灵的交往，因此他的作品在国外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研究巴金的专著，最早便是由法国明兴礼博士撰写的，六十、七十年代又有美国学者奥迦·朗、内斯·凯·茅及苏联学者Л. А. 尼科尼斯卡娅等人分别写成专论；而在我国，最早的评传是由香港余思牧先生写成的。他们对于巴金的研究都做出了极为可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巴金在海外的地位。

巴金早年的世界观是极为复杂的。他曾经是安那其主义的热情的宣传者和坚定的信奉者。以后，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的安那其主义逐渐地得到扬弃。在政治上，他从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到逐步地靠拢党；无论在蒋介石反动的“文化围剿”期间，还是在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坚定的同盟者和勇敢的战士。解放以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在艰苦的朝鲜战场上以及日常的生活劳动中，刻苦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从而能够比较全面地领会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实质。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思想得到了磨炼和砥砺，在他近年

来的作品里，思想解放，青春焕发，洋溢着真挚动人的感情。

正象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样，巴金也是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早年的思想的弱点和长处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他的安那其主义体现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犹如汪洋大海一般这一极为重要的社会特点，它们是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典型反映，即“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①。说明这一论点的最好论据是历史事实：就在一九五八年全国报刊连篇累牍地“讨论”巴金作品、批判巴金无政府主义“反动性”的同时，一场大规模的“共产风”以及取消工资、推翻价值观念、跑步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等等属于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接着，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巴金被宣布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要彻底批倒批臭的时刻，克鲁泡特金的那些关于未来社会的反动幻想统统被那些“革命派”推上了“尖端”和“顶峰”。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每当批判巴金最烈的时刻，也恰恰是这些早已被巴金所摒弃的思想异常猖獗的时刻。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托尔斯泰的不抵抗，是俄国“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巴金早年所信奉的安那其主义的大泛滥也使“文化大革命”变成中国人民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夭折的绝境——虽然此时这些思想与巴金毫无关系。巴金在思想上所经历的“苦难的历程”也反映了中国人民走向觉醒的某些共同特点。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五

①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四运动走到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经历了摸索、追求、希望、欢乐、迷信、痛苦直至最后重新清醒地面对世界和将来，这一过程难道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吗？他的道路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从这个方面来看，巴金的作品又具有极其重大的认识价值。

组成巴金艺术风格的主旋律是作家那巨大的热情。然而，它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又有不同的表现。概括地说，它的发展轨迹是从热情到冷静的循环。纵观作家解放前后的创作全过程，我们发现他的风格的发展似乎是画了两个圆圈：解放前，巴金在他三十年代的创作中，倾吐了作家对旧社会的“近于疯狂”的恨以及对理想社会的如饥似渴、迫不及待的追求，而到了四十年代，特别是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当作家对现实有了深刻的理解后，他的艺术风格开始变“冷”了，他对旧社会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及猛烈的抨击开始变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更为冷静、客观同时也更为深刻的剖析；解放以后，巴金出于对党、对新中国以及对人民革命事业的热爱，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热情，他讴歌祖国大地上发生的种种变化，其中当然也包含着某些错误的成分，然而“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摧毁了作家对新中国抱有的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场浩劫把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形态的不成熟、不完备以及潜藏着的种种危机作了彻底的暴露，从而使作家的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他又一次变“冷”了。他在晚年的重要作品《随想录》里，力图开始对三十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冷静地反省和总结。毫无疑问的是，这前后两个“圆圈”，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从表现形式上看则有着共同性。在这里，作家对社会本质的认识 and 把握是造成这种转变的决定性的原因。于是，表现在作家的创作方法上，则是从具有较多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中逐步地深化其中的现实主义部分。

巴金的创作是丰富的，巴金的思想是复杂的。本书的任务是客观地分析、研究并评价作家的思想和作品，而对他的生平事迹仅作简单的涉及。

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
人类。

——巴 金

第一章 巴金早期世界观的形成

一 巴金童年及少年时期受到的教育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诗经·召南·甘棠》里的“蔽芾甘棠”意。（蔽芾，树木茂盛貌；甘棠，今名棠梨树。）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诞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的大家庭中。

巴金的曾祖做过县官，曾著有《醉墨山房仅存稿》一卷；祖父也做过几年官，刊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抄》；父亲李道河，曾任四川广元县知县。

巴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成都度过的（仅在四五岁时曾随父去广元县）。辛亥革命发生时，在闭塞的川西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虽然川汉铁路风潮以及一九一一年农历十月十八日的兵变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但是革命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巴金就在这样一种充满“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①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生活

着。

巴金童年时代的第一位先生就是他的母亲陈淑芬。根据作家的回忆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②这种“爱的教育”实质上已带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及人道主义的色彩，它对巴金后来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启蒙作用。巴金的父亲虽然官为知县，离职时置起了四十亩田地，但看来也还清正。所以他能听从妻子的劝告，对犯人废了肉刑、死刑，并且还编过一本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可见他的思想里也有一些民主的因素，这对巴金也有一定的影响。

母亲的教育使巴金幼小的心田里从此埋下了“博爱”的种子。他爱亲人，也爱仆人，甚至不愿看见一只鸡被杀。这种思想，以后就发展为爱全人类，发展为对一切弱小的受欺压的“小人物”的同情。

这种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使巴金从小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接触到劳动人民。他说：“在公馆里我有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跟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跟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③“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种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跟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④这种接触

① 巴金：《短简（一）·我的幼年》。

② 巴金：《短简（一）·我的几位先生》。

③④ 巴金：《忆·家庭的环境》。

使这位年幼的小主人开始看到了生活中的另一面，看到在平静和睦的幸福之中，另一种人还过着不幸的生活，“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①在仆人中幼年巴金受到了朴素的阶级教育，使他能够从小用另一副眼光去看待这个社会，能够怀疑这种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而最先引起他怀疑、不满以至反抗的就是封建大家庭的统治基础——封建礼教。幼年时期的巴金常常躲避参加敬神敬祖一类的活动，甚至有一次还为了拒绝下跪而挨了一顿打。他说：“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那些虚伪的礼节和应酬”，我“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②。

在这些“下人”中间，对巴金影响最大的的是一个姓周的老轿夫。他是一个经历丰富而又备尝人生苦辛的人。但是他并不憎恨旧社会，反而执著于自己的对生活的信念：“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这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他使巴金从小就懂得了一个人不论在什么逆境下生活，总应该挺直自己的腰杆，永不放弃自己忠诚正直的生活态度。这位轿夫被巴金称为“第二个先生”。

巴金的“第三个先生”是他的朋友吴先忧。吴是巴金少年时期曾进过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不过年级比他高。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他的家境尚好，但由于要贯彻“不劳动不得食”的生活准则，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去学做裁缝。这种毅力及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巴金深受感动。后来在《激流三部曲》里，作家还特意写了张惠如、张还如兄弟俩，从他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吴的影子来。

这三位“先生”给巴金的人生观奠定了三个基本的因素：

① 巴金：《忆·最初的回忆》。

② 巴金：《忆·家庭的环境》。

“爱”、“忠实”与“自我牺牲”。

一九一四年母亲的病逝以及一九一七年父亲相继病故，这两件事对巴金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激变。父亲的死“使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象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①。这些“压迫”主要来自陈旧的封建家庭观念以及长辈的威权。在这虚伪的礼教的囚牢中，巴金看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在挣扎、受苦以至死亡。于是，他心中燃起了“憎恨”的火苗，“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②。年轻的巴金的目光从仆人、从自己同辈人的不幸遭遇中，开始投向了社会，开始从家庭的专制想到了社会的腐朽。他说：“我开始觉得现在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们是不是能够改造它，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点。”^③这一想法的产生，无疑是少年巴金思想中的一个飞跃。这种叛逆思想的产生从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制度已是山穷水尽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巴金后来的世界观中的长处和弱点也都孕育在现在的胚胎之中：他在很多文章里曾反复诉说过自己内心的“矛盾”，其实这在他幼年、童年、少年时期就已经以萌芽状态出现了。不论后来产生的诸如制度与人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以及理智与感情的矛盾等等，这一切都是从“爱”与“恨”这一对基本矛盾中派生出来的。这个基本矛盾乍看起来很抽象，不好理解，但只要运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作为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巴金在这个阶级注定要灭亡之前，一方面固然看到了它存在的不合理与罪恶，并同情那些被压迫者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又与旧家庭在思想感情上割不断千丝

① 巴金：《忆·家庭的环境》。

②③ 巴金：《短简（一）·我的幼年》。

万缕的联系。他“恨”这个家庭制度，因为它吞噬了多少无辜的青年人的生命；但他又“爱”这家庭中的成员，不能从阶级本质上去把握他们的基本属性，不能摆脱温情脉脉的感情之网。因此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矛盾：他所恨的恰恰就是他所爱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寻求的唯一解脱也就必然是把制度与个人截然分开，即认为制度才是罪恶的渊藪，而个人即使本人是作恶者也是无辜的。这种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把制度与个人如此截然地分家当然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认识后来表现在作品中则出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描写。如在《家》中被无情地鞭笞和揭露的克定、克安之辈，到了《憩园》里竟会成了杨老三这样一个叫人怜悯的人物。正因为巴金从一开始就以这种极其矛盾的心理来接受以后的来自各方面的教育，所以他在成长的道路上也就不可能消弥这种矛盾，相反只会加深扩大这种矛盾。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它唤醒了巴金。随着报纸上对北京、上海等地学生运动的报道，新的思潮开始冲向盘根错节的封建老窝中的每一个角落。《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都接连涌入内地。巴金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传播新思想的刊物。作家曾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心情：“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惶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①而最先打开少年巴金的心扉的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一本小册子——《告少年》。这本书给予巴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使他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泪。他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

① 《巴金选集》后记，《读书》1979年第2期。